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年鉴

(2014)

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 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主 编：潘世伟 徐觉哉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年鉴 (2014)

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年鉴.2014/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ISBN 978-7-208-12758-6

I. ①世… II. ①上… ②上… III. ①社会主义-研究-世界-2014-年鉴 IV. ①D507-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10076 号

责任编辑 赵 伟

封面设计 张志全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年鉴

(2014)

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61 插页 2 字数 1400,000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2758-6/D·2615

定价 178.00 元

序

肖枫^①

两年前,我国第一部《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年鉴》(以下简称《年鉴》)在上海问世。今年夏天本书主编约请我为今年的《年鉴》作个序。开始觉得前面有三位先生作了序,我再来写有些犯难。后想无妨谈谈自己读《年鉴》的感受、希望和建议,权当是今年我为满三岁的《年鉴》而写的序,遂有了这些文字。

《年鉴》良好的开始必将是成功的一半

三年来《年鉴》成长迅速,一年一个样,越长越漂亮。《年鉴》走向社会跨进学界,令人眼前一亮,获得广泛的赞誉和好评,值得庆贺。编纂出版《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年鉴》在中国是头一回,在世界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常言道,万事开头难,但良好的开始必将是成功的一半。

所谓年鉴,顾名思义应系统、全面、真实地汇集上年重要信息和文献资料,逐年编纂连续出版。作为以“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为主题的专业性年鉴,其对象实际上包括了两个“世界”性范围,一是汇集的成果和信息“来源于世界”,二是这些成果的研究对象是“世界性的”,即世界社会主义。此外,除关注社会主义研究本身,还必须关注社会主义发展所依赖的国际环境和时代变化等客观条件。因此范围很广,难度很大,任务艰巨,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智力。然而尽管如此,三年来呈现在人们面前的这三本《年鉴》已经足够令人惊喜的了。

《年鉴》以国内外浩如烟海的报刊和新老媒体为来源,以重要思想库和学术机构的资讯为依托,精选了国内外对世界社会主义问题的各种研究成果和大量资讯,编纂成10多个专栏和若干附录,为读者提供了系统的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信息。从《年鉴》取得的这些成果看,完全可以说,它将成为以研究世界社会主义为主题的“集万卷于一书、缩一年为一瞬”的信息密集型工具书。

如果将这部《年鉴》与国内其他研究世界社会主义的出版物相比较,不难发现它有许多鲜明的特色和优势。《年鉴》以学者的“平民”身份对待读者,不以“权威”自居教训人;它以开放包容的胸怀对待不同观点的研究成果,充分展现出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它以博采众长的方式广揽国内外八方成果和

^① 原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副主任、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年鉴》顾问。

信息,使《年鉴》内容丰富精彩纷呈;它不限于反映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还以相当的篇幅反映世界的相关变化和形势,有助于国人开阔世界视野,广泛借鉴国际经验;它反映研究世界社会主义的进展和动向,不再是出于支援“世界革命”的陈旧观念,而是为着与世界沟通交流、学习借鉴,归根结底是以推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因此,《年鉴》的出版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坦诚而言,《年鉴》的基础虽好,但仍有改进余地和发展空间。我建议《年鉴》今后应在“全”、“真”、“新”、“精”、“特”、“便”6个字上进一步再作努力。所谓“全”——指栏目框架设计齐全,编纂内容辩证全面;“真”——指反映的事实客观真实、权威可信,符合实事求是原则;“新”——指内容观点新颖,富有创意新意;“精”——指取材精选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文字浓缩精炼;“特”——指发挥自己图文并茂的特色,进一步增加可视可读性;“便”——指进一步方便读者检索,让《年鉴》真正起到工具书作用。另一方面,在保持“常设栏目”和工具性“附录”基本稳定的前提下,还可为当年的某些“大事、新事、特事”临时设立条目,也可根据不同年度的中心话题,形成当年的“年度主题”。不同特色的“年度主题”,使每年所聚焦的问题具有历史纵深度和理论新高度,从而使《年鉴》的信息“纵向成链、横向成片”,更具实用、史料和理论价值,进一步提高《年鉴》的影响力。这样,《年鉴》虽然逐年连续出版,但因每年情况各不相同、各具特色,而使其常出常新。

《年鉴》归根结底应以“基本理论问题”为中心

“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必须搞清楚的“基本理论问题”。他说“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并说,这是“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①这个问题为什么如此重要?

首先,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要回答和解决的最核心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改革开放,首先是思想上的解放。思想解放,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而这是一个不断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过程。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我们曾经把资本主义的范围无限扩大,用形而上学的办法解释它们的差别。比如,在农村,把农民发展家庭副业统统当成资本主义的东西,甚至如邓小平所说,“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②谁多养了几只鸭子,就要挨批挨斗,补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改革开放初期,有些地方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开始也遇到思想阻力,被指责为“单干”、“复辟资本主义”,后来是农民的实践一步步地证明了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和偏见,认识才逐渐扭转过来。改革开放后,允许搞个体经营并允许雇工,但是当雇工达到20人时,不少人担心会变成“资本主义”,曾引起很大的风波。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顾委会议上说:“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223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61页。

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 伤害了社会主义吗?”^①后来,实践证明这影响不了社会主义大局。人们的认识逐渐从禁锢的形而上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一步一步地将改革推向前进。

经过30多年来的实践,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与当初比起来,可以说已是“天壤之别”。中国的改革是随我们在这个基本理论问题上的“进步”而不断“深化”的。经过改革的实践,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我们已做出了完全不同于传统观念的回答,终于创立了崭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和道路。要继续向前发展,仍离不开继续搞清楚这个问题,因为现在遇到的许多新问题,仍与对这个老问题的认识密切相关,要在搞清这个老问题的基础上才能找到解决的办法和出路。实践在发展,人们的认识永无止境。正确的认识要经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多次循环反复。

其次,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表明,这也是整个国际共运史上的普遍性经验教训。邓小平说:“我们提出的课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苏联也在研究,他们也没有解决。”^②又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③。当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照搬苏联的做法,也没解决好这个问题。长期来影响共产党人搞清楚这个问题的障碍在哪里? 看来不在这个或那个具体问题上,而在总的指导思想。这集中表现在低估了资本主义、高估了社会主义、看近了共产主义、忽视了封建主义,从而扭曲和僵化了马克思主义。低估资本主义,造成对资本主义发展潜力估计不足,将其寿命看得太短,过早否定资本主义进步的社会作用。高估社会主义、看近共产主义,导致在建设实践中急于求成,超越发展阶段,追求“大、公、高、纯”,搞什么“割资本主义尾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破坏社会生产力,甚至酿成经济和社会危机。忽视封建主义,导致将封建主义的东西当成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来推崇,使社会主义发生严重扭曲。

苏东剧变后,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根据本国情况进行改革,但因对这个基本问题的理解和认识不同,各国的实际做法很不一样。当前5个国家呈现出两大类型:中国、越南、老挝这3个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经济发展快,国家实力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较快;朝鲜和古巴坚持计划经济体制,没摆脱“短缺经济”的困扰,但百姓仍享受国家提供的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等在内的社会保障。两国物质供应都比较紧张。20世纪60年代,朝鲜强调要为人民“住瓦房、吃大米饭、喝肉汤、穿绸缎”、为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主义”而奋斗。90年代突出强调思想教育,强调必须占领“物质堡垒”和“思想堡垒”,而“攻占思想堡垒的斗争要走在前面”。古巴认为,“没有计划就没有社会主义”,“市场是一个无人驾驭的疯狂的野兽”。随着经济政策的调整,计划经济仍起主导作用,但主张“利用市场”,“在国家的调节下,给市场机制一个空间”。古巴最大的实际是“美国威胁”,在美国超半个世纪的封锁下,古巴实际长期处于“准军事状态”。古巴更看重社会“公平”而忽视鼓励“多劳多得”,分配上的“大锅饭”体制比较严重。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0—91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58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

1991年苏联解体后,古巴面临生存威胁。1992年古巴物资储备局长邵黄将军为解决物资供应紧张想出一个办法。他将物资局旁边的一块空地让几个职工承包起来种菜,其收益较高引起非议。有人不平地说,“他们比部长的收入还高”。后来L.卡斯特罗得知此事就说:“他们是劳动所得,有什么不可以?”在L.卡斯特罗支持下,后来“城市菜园”很快就在全国城市推广,多少缓解了一点食品供应紧张。1993年古巴决心改革,逐渐恢复了农贸市场,允许个体经营,允许农民承包闲置土地,并采取发展旅游业,吸收外资等一系列古巴称之为“模式更新”的改革。

第三,再扩大点说,这也是世界一切想搞社会主义的国家必须搞清楚的问题。邓小平曾经对想搞社会主义的非洲朋友说,要充分研究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要研究一下,为什么好多非洲国家搞社会主义越搞越穷。不能因为有社会主义的名字就光荣,就好”。^①这是1980年他同阿尔及利亚的客人说的。1988年他又劝莫桑比克的朋友“根据自己的条件,可否考虑现在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他说“确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是可以的,但首先要了解什么叫社会主义,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要讲社会主义,也只能讲符合莫桑比克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②这说明,在邓小平看来,搞社会主义不能不考虑自己国家的客观条件,条件不具备时勉强搞,搞出来的也是不够格的。邓小平强调“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

第四,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互关系的新趋势看,《年鉴》在为国内解决这个“基本理论问题”上大有可为。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已不再是昔日那种“不共戴天、你死我活”的关系,而是一种虽然有本质区别、虽然存在矛盾和斗争,但总体上已是“相互借鉴、取长补短、长期共处、共同发展”的关系。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对于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如邓小平所说可以采取“拿来主义”^③,许多反映社会化、现代化的管理经验,完全应该学习借鉴。常言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可以收集反映研究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管理社会、治理环境等各个方面的“治国理政”经验,供国内参考借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中国现代化的新阶段,也是解决邓小平提出的“基本理论问题”的新阶段。《年鉴》在这方面是大有可为的。

当然,《年鉴》所反映的内容来自国内外学者或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人家研究什么、如何研究是人家的事情,对此《年鉴》编者是无能为力的。然而《年鉴》抱定什么样的编纂宗旨,以什么问题为重点或中心,从什么角度去选择来源和资讯,按什么要求去编纂,这都是《年鉴》编者可以决定的。作为一部中国人出版的《年鉴》,力图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急需解决的基本理论和实践问题,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虽然编者要受资讯来源及内容的局限,只能“来什么米做什么饭”,但总体而言,要让《年鉴》服务于国内需要,归根结底要落实到为解决邓小平提出的“基本理论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上来,这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2—31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0—261页。

③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36页。

办好《年鉴》要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办《年鉴》当然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对马克思主义有个如何理解的问题。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时指出:“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他说,过去中苏开展的那场争论,“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100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接着邓小平又强调,“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①这就是说,对马克思主义不只是简单地“坚持”就够了、就能解决问题了,而是同时存在着如何“认识、继承和发展”这样三个方面的问题。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一句话,要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首先,《年鉴》的主题词“世界社会主义”,遇到了要澄清概念内涵和范围的问题,这就需要解放思想。现在有两种各走极端的看法,一种是只有各国共产党信奉的“科学社会主义”才是唯一正确的社会主义,另一种是只有社会党的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才能振兴世界社会主义,甚至提出了“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两种极端化的看法都是不可接受的。高放先生在创刊号序言中提出的世界社会主义有“大三家、中三家和小三家”的说法,我是赞成的。我觉得,总的原则应采用“泛社会主义”,即“广义社会主义”的概念,这就是除科学社会主义之外的其他各种社会主义流派,也都可以包括在“世界社会主义”的研究范围之内。只要是搞社会主义的,宣称要搞社会主义的,都可以承认他们就是自称的那种“社会主义”。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上,不能搞宗派主义的小圈子,应当把朋友搞得更多的。马克思主义本身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习近平同志近年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和实践源头时,并不是只从《共产党宣言》发表、科学社会主义创立讲起,而是一直追溯到空想社会主义,讲了差不多500年。我们的这个《年鉴》没理由只讲共产党的科学社会主义,而将其他各种名目的社会主义排斥在外。对当今世界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应采取包容开放的态度,支持世界社会主义多样性发展,这符合世界社会主义“独立自主”和“民族特色”的历史趋势,又可增加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底气。

第二,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上,必须从陈旧的形而上学的观念中解放出来,根据新情况提出新思路。现实情况表明,不能再用过去“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绝对化的旧观念看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两个主义”之间虽有本质区别,虽有矛盾和斗争,但彼此也在“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交流合作”。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新历史条件下,二者的关系正在向着改善、接近、合作,甚至是所谓“趋同”的方向发展。现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展望未来这种趋势还会继续发展。

第三,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方式和道路问题上,必须从“十月革命道路是放之四海而皆准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页。

的”传统观念中解放出来。中国革命与俄国十月革命采取的都是“暴力革命”的方式,但具体方式也不完全相同,十月革命是城市起义,而中国是农村包围城市。上世纪后半期“欧洲共产主义”提出了与十月革命“暴力革命”完全不同的主张,曾遭到国内有些人的批判。但邓小平却采取了开放包容的态度,在1980年提出:“欧洲共产主义是对还是错,也不应该由别人来判断,不应该由别人写文章来肯定或者否定,而只能由那里的党、那里的人民,归根结底由他们的实践做出回答。人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进行探索,这不能指责。”^①1988年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又进一步提出,“我们走的是十月革命的道路,其他国家再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难了,因为条件不一样。”^②这说明邓小平又前进了,实际上已否定了“十月革命的道路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旧观念。如果邓小平健在,按这一思路走下去,一定还会提出许多新的想法和思路。

第四,要深刻理解邓小平说的“再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难了”的深远意义,顺其思路去研究,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将有新局面。首先是邓小平的这一论断,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式将呈“多样化”的趋势。过去我们常说的社会主义最终将“取代”资本主义,这个“取代”就很有文章,很显然这种“取代”具有长期性,方式具有多样性,道路具有曲折性。就“取代”的方式来说,不外乎资本主义“体制内改良”和“体制外革命”这样两种方式,但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新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体制外暴力革命”的方式越来越困难了。与此相反,即一点点地通过“体制内”的改良和改革,来否定资本主义的方式却大为增多了。这种方式虽然不可能“一下子”变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但它可以促进社会的公平、推动社会的进步,促进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主义因素”的增长。这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历史总趋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表现形式和反映。与此相联系,我们对一切主张改良资本主义的政治主张和政治力量,决不应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

当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是决不能抹杀和混淆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两个主义”间的本质区别集中表现在政治上,即政权性质、国家性质不同。我们在与资本主义开展相互借鉴和合作的同时,必须坚持与资本主义在政治制度上的“和而不同”,决不能犯苏共改旗易帜“丢失政权”的“颠覆性错误”,这条底线一定要守住。总之,在发展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下,对世界社会主义的研究必须继续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最后,感谢《年鉴》主编聘请我为学术顾问,并约我写序。以上所言谨供参考,不当之处,敬请编者、读者教正。

2014年10月于北京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9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15页。

2014 年度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报告

徐觉哉^①

2014 年,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注定又是一个不平静之年。美国霸权从顶峰上跌落、欧盟各国经济严重衰退、发展中的新兴市场国家异军突起、社会主义中国的和平崛起。由于共产党执政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都在发展,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主义出现了俄罗斯、印度、南美和南非等 4 个亮点,欧美发达国家在困境中出现了马克思热、占领热和中国热的光亮,所以当前世界发展的总趋势是资本主义逐渐衰落、社会主义在曲折中走向复兴。把握这些发展的脉络和趋势,有助于我们看清世界发展的未来走向。

在这一年中,我们看到,为“资本主义危机病”诊断的著作成了图书市场的热门,而法国经济学家 T.皮凯蒂风行的《21 世纪资本论》,因揭示了资本回报率高出经济增长率而导致贫富不均的资本主义铁律,成为本年度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在以乱象编织现实版民主故事的时刻,西方自由主义旗舰杂志、英国《经济学家》罕见地刊发长篇大论《民主的病在哪儿?》,一番“民主在全球的发展停滞了,甚至可能已成逆流”的表态实属振聋发聩,从而引发各国读者的热议和争论;俄罗斯正在以更强硬的姿态重返国际舞台,展示出“重建帝国之梦”的壮志雄心,乌克兰的全民公决,让西方看到俄罗斯已经着手全面反击,而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三国《欧亚经济联盟条约》的签署,又可以直接听到“重返苏联”的脚步声;一战的百年纪念唤起了人们对历史的记忆,是它引爆了俄国革命,催生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地区性分化,形成了 20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和演变的基本格局;德国迎来标志着冷战结束的里程碑事件——“柏林墙倒塌”25 周年的纪念,人们在一道 15 公里长的柏林墙“灯光边界”释放了 8 000 个象征此墙消失的发光球,传递出“柏林墙倒塌”是解决当前世界一系列危机的希望之光……

本年度报告将在科学社会主义经典文献的深度解读、为 21 世纪“资本主义危机病”诊断、警惕“民主”正在成为国家解构和破坏的力量、世界左翼力量现状分析、深化对社会主义前沿问题的研究、俄罗

^①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中国社会主义学会世界社会主义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副会长。

斯掀起重评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的热潮、关注各派社会主义思潮的最新动态、世界政党政治的基本走向、社会主义思想史新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学理解、社会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上的一幕、解密的文献档案披露历史真实内幕等 12 个方面,综合各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报告如下:

科学社会主义经典文献的深度解读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浩如烟海,对原著的辅导也有多种版本,而我们需要一种严谨的科学的解读。譬如对共产主义观的理解,不少人把《手稿》中的一段话当作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概括,然而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江流认为这样做不够准确、完整和全面。他在《马克思论共产主义社会的初述——对〈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Ⅲ〈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的解读》一文中,结合社会主义思想史的考察,对《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Ⅲ《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作了重新解读。该文以充分的论据说明,不应当把《手稿》中的“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那段话,解读为马克思对自己共产主义观的完整论述,认为“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这段话,说明这种共产主义不仅是一种废除了私有制的经济制度,而且是一种新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准确地说,这是马克思用 L.费尔巴哈的语言来表达“这种共产主义”的观点。对于这种共产主义,马克思是既肯定,又超越的。这就把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模糊的、似是而非的认识澄清了。尤其可贵的是,文章还进一步以《共产党宣言》和《哥达纲领批判》为依据,阐述了马克思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一贯坚持而又不断丰富的共产主义主张,既肯定共产主义就是废除私有制,又指明它只是走向未来理想社会“最近将来”的一个阶段,即建立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但这样的共产主义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和人类社会的形态。在以后的论述中,马克思又不断加以完善,用“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来说明这样一个联合体,这比《手稿》中有关共产主义社会的论述更加清楚明确了。

马克思的人类学思想一直是社会主义研究中的重要议题。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国外马克思主义阵营中,曾经就这一思想掀起过一阵研究热潮,其中著名的人类学家 L.克拉德与布达佩斯学派理论家 G.马尔库什之间关于“人的本质”问题的争论,成为当时具有代表性的理论事件。L.克拉德曾质疑 G.马尔库什,“意识能否作为人的本质的要素,与劳动、社会性并列?”G.马尔库什回应,既然经济基础的变化不能完全与上层建筑的发展同步进行,那么人类的劳动和社会性存在也很难保证在时间和逻辑上对意识具有优先性,而且随着人类意识的发展,语言、文字成为意识的高级外化表现形式,在人类的生产性活动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构成了人类社会化生活的重要内容和实现方式。由此,G.马尔库什认为劳动、社会性和意识是社会生活的所有历史形式中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元素和特性,而且三者是“人的本质”的相互平等的要素。黑龙江大学孙建茵教授的《对马克思人类学思想的不同解读——从 G.马尔库什与 L.克拉德关于“人的本质”问题的争论谈起》一文,从两位学者对马克思“人的本质”概念的争论入手,简述了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对马克思人类学思想的不同解读,从而阐发了用一种整体的、辩证的、跨学科的、多视阈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人类学思想的观点。该文指出,在某种意义上,G.马尔

库什为我们提供了理解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概念的钥匙。但是,对于马克思的人的本质概念而言,关键的问题不是抽象地讨论人的劳动、社会性和意识等基本的规定性,而在于把这些特性置于人不断生成、不断发展的历史统一体之中。

如何看待社会平等及其实现途径,是我们需要回答的一个现实中的问题。历史上,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 E. 鲍威尔 (Edgar Bauer, 1820—1886) 曾抽象思辨地理解 P. 蒲鲁东 (Pierre-Joseph Proudhon, 1809—1865) 的平等思想,从神学批判角度加以驳斥。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一书中,通过对 P. 蒲鲁东和 E. 鲍威尔思想的比较,深刻地批判了 E. 鲍威尔等的“超实践”的形而上学,为创立以感性实践为基础的新的政治哲学作了重要的理论铺垫。南开大学李淑梅教授的《探求社会平等及其实现途径——〈神圣家族〉对 P. 蒲鲁东平等思想和 E. 鲍威尔的思辨歪曲的评判》一文,梳理了这段思想史。该文指出,对于平等问题,马克思是从政治经济学角度予以评判的,他肯定了 P. 蒲鲁东批判私有财产的合理性,同时指出他受到国民经济学理论前提的局限。P. 蒲鲁东从贫困的事实出发,而 E. 鲍威尔却将富有和贫困合二为一,把拥有和不拥有歪曲为概念;P. 蒲鲁东主张建立人与人平等的实践关系,而 E. 鲍威尔“超实践”的形而上学背离人人平等的实践要求,鄙视人民群众。马克思区分了人们的经济关系和法律上的财产权关系,通过对贫困和富有两种事实的分析,认为平等是人的“类意识和类行为”,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相互对等关系,无产阶级自身生存条件的改变是实现平等的根本途径。马克思的这些观点和方法对于推进政治哲学的研究、坚持社会平等和公平,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学界关于社会正义问题的讨论,是中国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在理论和观念上的反映,也是学术研究中的难点。20 世纪 70—80 年代,英美学者曾就马克思与正义问题展开过一场大讨论,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一些学者也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并提出一些不同于英美学者的新见解。有的认为,马克思是在总体性视域内,通过批判私有财产制度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阐发正义思想的,呈现为包括“个人所有权”、“分配正义”以及“人的自我实现”在内的立体性结构;有的认为,应该在超越康德伦理学的意义上来理解马克思的正义观,这种正义观本质上并非源于道德律令,而是源于感性的人类活动,是基于历史性的实践活动并指向共产主义的正义观。为了开掘马克思思想资源中的社会正义思想,彰显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和在场性,就需要进一步对马克思的正义观作深入的解读。中国人民大学段忠桥教授的《没有“不以时间和现实变化为转移的”终极正义——论马克思正义观的三个根本性问题》一文,就正义在马克思的论著中是价值判断还是事实判断、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剥削是正义的还是不正义的、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是否属于正义等问题作了回答。该文通过对马克思相关论述的分析,提出正义在马克思的论著中是价值判断而不是事实判断;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剥削是不正义的,因为资本家无偿占有了本应属于工人的剩余产品;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仍存在不正义,这表现在它的两个弊病上,即由偶然的天然和负担的不同所导致的人们实际所得的不平等。因此,在这两种分配正义要求背后不存在一种终极意义上的分配正义原则,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就不相信有什么“永恒的、不以时间和现实变化为转移的”终极正义。

近年来,国内学界有人提出“马恩晚年思想转变”说,其基本论据有两条:一是“《资本论》第 3 卷推翻第 1 卷”,即晚年马克思目睹资本主义的新发展,看到银行、股份公司使得生产越来越社会化,从而

在《资本论》第3卷里提出,由于股份公司的出现,股权分散了、对生产的管理转移到专业管理者手里了、资本家的统治权虚化了,因此资本主义的“外壳”用不着再“炸毁”,剥夺者用不着再被剥夺,经由革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已经不再需要,资本主义将会自己实现“自我扬弃”,和平地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样,第3卷完全颠覆了第1卷的革命主张,马克思晚年的思想彻底转变了;二是恩格斯为《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所写的导言,认为它是恩格斯放弃革命和倡导改良主义的佐证。

北京大学张光明教授不同意这种观点,他在《〈资本论〉第3卷是否真的推翻了第1卷?——关于“马恩晚年思想转变”的辨正》一文中,以确凿可靠的文献和历史事实,对这些观点做了考察和分析。作者认为,关于“《资本论》第3卷推翻第1卷”的说法,是一种找不到文本依据的杜撰,它既忘记了第3卷中论述“自我扬弃”的篇章是在《资本论》第1卷出版之前就写成的史实,也曲解了第3卷中关于资本主义“自我扬弃”的论述。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一生中都是既讲“自我扬弃”又讲“炸毁”和“剥夺”,二者的统一正是马克思学说的基本常识。今天应该从马恩的理论中吸取有益的方法论,走出他们的局限,重新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性,而不能曲解他们的思想,把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强加给他们。在《恩格斯晚年为改良主义开辟道路了吗?——对恩格斯1895年〈导言〉解读》一文中,他又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的考察,回答了(1)《导言》中所说“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错了的是什么?(2)《导言》所说“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实方面都已经过时了”,过时的是什么?(3)关于普选权、合法斗争道路和“未来的决战”等挑战性问题。该文认为,《导言》是在19世纪晚期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合法斗争获得重要进展的背景下撰写的,恩格斯力图从对资本主义的新认识出发,对1848年革命经验作出新的反思和批评,并对社会主义运动新的策略适时作出总结。该文指出,恩格斯的晚年思想从策略层面就能很好地予以理解,根本用不着像“转变论”者那样,过分夸张地上升到根本放弃自己理论的高度。

长期以来,我们将社会主义理解为一种社会制度,这种理解当然是有着经典文献的支撑,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研究经典作家进行理论建构过程中的相关文献,就会感到这种理解并不能包含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全部。安徽师范大学王义德教授的《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制度——基于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一文,从马克思怎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及如何对当时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进行改造的角度,揭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社会制度,还是以普遍人的自由为核心的价值观和以“社会”为本体的世界观。世界观是价值观和社会制度的基础;价值观是建立在世界观基础上的,又是社会制度的灵魂;而社会制度则是建立在世界观、价值观基础上的基本规范。该文认为,还原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世界观、价值观、社会制度的三维统一,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清马克思主义是一块整钢,促进在理论上将马克思主义整合成一个有机整体;有助于我们摆脱将社会主义看作一种社会制度的狭窄理解,突破改革中存在的认识障碍;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清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为21世纪“资本主义危机病”诊断

围绕着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的最新历史发展阶段、发展形态、本质特征及其未来走势,产生了各种

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厦门大学吴茜副教授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是帝国主义的最高阶段——当代资本主义理论分析框架和解释范式的再重构》一文,试图对当代资本主义理论分析框架和解释范式进行再重构。该文剖析了当代垄断资本主义最为显著的4个本质特征,即生产和资本的高度集中,形成了以巨型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全球寡头垄断市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及虚拟经济主导世界经济,实现了攫取全球垄断利润的剥削方式创新;出现了欧共体、8国首脑会议、IMF等超级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形成了美国“一超独霸”的“新帝国主义”。该文认为,这些特征表明当代资本主义已进入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然而,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反新自由主义剥夺性积累的全球左翼激进政治运动,以及生态危机的加剧,都预示着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已由盛而衰,这种不顾任何社会、生态和政治后果的无止境的资本积累的资本主义制度,终将被一种全新的、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社会主义新秩序所替代。

国外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内容丰富、视角多样,无论是其提出的问题和观点,还是其理论中所蕴含的难题,对我们深入思考当代资本主义都有重要的意义。复旦大学汪行福教授在《资本主义是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过程——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提出五大批判》一文中指出,在金融危机和占领华尔街等抗议运动之后,时代精神似乎发生了改变,主要表现为:一是资本主义批判主题的回归;二是阶级斗争语言再次回到思想的中心;三是“另一个世界”的可能性受到严肃的对待。同时,作者从金融资本主义、债务资本主义、技术资本主义、灾难资本主义和文化资本主义等多个视角,介绍了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全方位批判,并指出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也包含着明显的弱点,即其对资本主义的理论批判与争取“另一个世界”的现实政治仍然是脱节的。

最近,为“资本主义危机病”诊断的著作也成了图书市场的一个热门,一批相关的作品陆续上市。在我们看到的书中,一本是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的《历史与反复》。作者把19世纪资本主义体系称之为“帝国时代”,现在的资本主义则是“新自由主义时代”,而“新自由主义与帝国主义时代一样具有贫富差距悬殊的特征。”他还提到,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存在着自由主义、帝国主义、自由主义、帝国主义……这样持续的反复,这并非线性的发展而是一种循环,一个阶段的持续时间大约为60年,每120年就会面临相似的状况。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霸权国家,其后迎来了自由主义的阶段;1990年以后美国经济衰退后,下一轮的争夺战又开始了,将重新开启帝国主义的时代。作者特别指出,“我们现在所说的新自由主义,已经与自由主义几乎完全脱离了关系,应该称其为新帝国主义。”另一本是英国学者D.哈维的《资本主义的17个矛盾及其终结》。该书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说起,指出了当今资本主义体系存在的17个矛盾,试图说明资本存在的多面性,蕴含了环环相扣的多种矛盾。书中认为,应该“把革命性的人道主义与基于宗教信仰的人道主义结合起来”,如此才能对抗各种形式的异化,并从根本上将世界从如今盛行的资本主义方式中纠正过来。还有一本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斯蒂格利茨的《不平等的代价》。该书讨论的话题围绕发展能否解决贫困和缩小财富分配差距问题。作者否认了“涓滴经济学”(trickle down economics)的作用,认为社会经济整体的发展并不必然带来下层的“脱贫”,相反“聚集到上层群体的财富是以牺牲中下层群体为代价的”。书中阐述了当今引起关注的三大主题,即“第一,市场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因为它们显然既无效率也不稳定;第二,政治体制并没有纠正市

场失灵;第三,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在根本上都是不公平的”,并试图解释这三大主题如何密切相连。在他看来,机会不平等的程度在美国已经到了不得不采取一切手段来加以解决的时候,他甚至还提出需要减少1%群体政治势力的问题。再有一本是I.沃勒斯坦、L.柯林斯、M.曼、G.杰尔卢吉扬、C.卡尔霍恩5位学者合著的《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他们从历史社会学的视角切入问题,考察宏大的历史结构性因素和趋势,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系统性的矛盾和弊病来推演未来,并提出“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的质疑。I.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体系将进入结构性危机阶段,最终走向衰亡;L.柯林斯着眼于科技更新,推断中产阶级的结构性失业将使资本主义难以维系;M.曼将资本主义的未来寄望于社会民主主义式的改良;G.杰尔卢吉扬否定了苏联式共产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可能性;C.卡尔霍恩则着重探讨了未来资本主义出现漫长停滞、改良或被全新制度代替的可能性等。

在这批书中,最夺人眼球的是法国经济学家T.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一本论述财富分配不平等的著作《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本书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轰动,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财富和收入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再度成为政治议题时,作者推出了一种有力的经济学模型,它将宏大的历史视角和精心的数据分析融合在一起,将经济增长、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分配,以及个人之间的财富和收入分配融合进了统一的理论框架,从经济学角度揭示了目前美国乃至全球财富不平等现象的根源。在T.皮凯蒂看来,资本回报率总是倾向于高出经济增长率,所以贫富不均成了资本主义固有的常态。2012年,美国收入最高的1%家庭获得了全国收入的22.5%,是自1928年之后的最高值。现在10%最富有的美国人占有全国财富的70%还多,比1913年镀金时代结束时的比例更高,而且其中一半是由最富有的1%的人占有的。可见,最富有的那批人不是因为劳动创造了财富,而是资本主义世界正退回到了“拼爹时代”,财富来自世代积累而非劳动创造,这也解释了贫富差距在资本主义体系里无法解决的根本原因。

当前美国学界围绕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及其带来的不平等问题,“左”“右”两派学者也一直争论不休。保守派捍卫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有效性,主张新自由主义缩减了绝对的社会不平等,宣称相对不平等的存在促进了向上的社会流动;自由派则大多是凯恩斯主义的支持者,强调新自由主义盛行以来社会相对不平等急剧增加。这场论战也是美国自由派和保守派两大主流思想派别的政治理念之争,充分地体现了两者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中国社会科学院于海青副研究员的《当代美国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根源何在?——自由派和保守派学者之间的一场思想论辩和交锋》一文,对争论双方的观点作了介绍,并分析了造成收入不平等的三大因素:1.全球化造成了非技术移民直接参与工作竞争,而远在其他国家的非技术工人也通过贸易间接地参与竞争,两者共同压低了美国非技术工人的工资;2.新科技革命提高了对高技术工人的需求量,从而造成“知识工人阶级”收入激增,拉大了与其他劳动阶层的收入差距;3.政策选择、规则和制度的作用非常关键,它们既能塑造全球化和技术变革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也能通过产品市场的解除管制以及社会支付、工资设置机制或工人协商权的变化对收入分配产生的直接影响。文章认为,这场思想论辩和交锋仍然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争论,最终目的是在体制范围内寻找一个医治资本主义弊病以平息社会矛盾和冲突的良方。

至于如何看待21世纪的资本主义?近期日本《经济学人》周刊专访了日本综合研究所理事长寺

岛实郎与日本大学教授水野和夫,最后得到的回答是令人惊讶的——“资本主义在 21 世纪初期已经终结”。他们提出资本主义终结的一个标志是,这些国家一般通过向非洲市场等“周边”扩展,提高作为“中心”的发达国家的利润率,从而推动资本的自我增值,但是“地理上的、物理的空间”这种“周边”恐怕已经不存在;另一个标志是利率的低下,如果把资本主义理解为资本的自我增值过程,那么现在作为资本主义核心的美国正在丧失领导世界的力量,而日本、美国、欧元区的政策利率大致是零。在他们看来,金钱游戏横行和金融庞大化是 21 世纪资本主义的特点,资本主义已经与提高国民生活水平相背离。不过要让社会整体的意识发生改变还为时尚早,就像不到 18 世纪不知道“中世纪已经结束”一样,人们也许要等到 100 年以后,才明白“资本主义在 21 世纪初期已经终结”。

警惕“民主”正在成为国家解构和破坏的力量

今年以来,围绕“民主”的问题,世界各国发表了无数有分量的文章和书籍,这是因为它是冷战后全球政治舞台上最突出的一面“圣旗”,尽管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及社会秩序毁在了这面旗帜之下,但对它的绝对膜拜仍弥漫在很多国家的知识分子中间,他们反对对民主提出任何质疑。然而,近年来被视为世界典范的西方民主体制似乎在变得过时而无用,太多的民主乱象正在促使一些有识之士对其进行思考。

我们发现西方自由主义最有影响的旗舰杂志、英国《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周刊也罕见地加入了这一队伍,刊发封面长文《民主的病在哪儿?》(*What's gone wrong with democracy*),从而引发各国读者的热议和争论。“民主在全球的发展停滞了,甚至可能已经逆流”,该文此番表态在西方媒体实属振聋发聩。现实背景则是万众瞩目的“阿拉伯之春”变成了“阿拉伯之冬”,茉莉花革命大步迈进欧洲,不仅乌克兰、土耳其等欧洲边缘国家发生动荡,在英法等老牌“民主”国家也先后发生大规模骚乱。埃及、泰国、乌克兰等地的局势使西方鼓吹的“投票民主”骑虎难下,美国大使在利比亚被“民主”后的民众杀死……每一次“美好”愿望都遭遇现实的冰冷反馈,让“民主”的故事连连受挫,难怪《经济学家》周刊开始尝试说出这个危机了。该文坦承近来焦虑情绪渐渐取代了基辅等地的政治变局带来的欢欣雀跃,建立一个可靠的民主政权远不止是赶走某个独裁者那么简单。文章认为,即便是那些已经稳固下来的民主政权,其体制逐渐暴露出的缺陷也开始引人担忧;即便在西方社会,伴随着民主制度也常常出现政府负债、内政处理效率低下、过度干涉他国内政等问题;随着西方国家暴露出越来越多的缺陷,民主在世界其他地区日益式微。文章把这种挫折归咎于两个原因,即 2008 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和中国的崛起,由此也探讨了两个主题,即西方的制度反思与中国的道路自信。

新加坡《联合早报》用了不少版面,连续刊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的《民主政治与社会冲突》、《当代民主危机:西方的认知》、《当代民主出了什么问题?》和《民主的危机及其未来》等系列文章,对 21 世纪民主所面临的危机和挑战进行了全面解读。文章指出,当代民主存在着西方民主内部的问题、非西方民主所面临的问题以及民主从西方向非西方传播和扩散过程中的问题。总体而言,在一些时候民主促成了国家的建构,但更多的时候民主正在成为国家解构和破坏的力量。文章认为,这种情况的发生与后发展中社会在不具备西方那样的有利于民主化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等各方

面的条件下,快速民主化、一步到位大众民主有关。在民粹主义氛围下,“理性的政治人”从来就没有出现过,更多的只是被动的政治参与者,在这个过程中,所谓“人民的力量”经常是破坏人民利益的有效工具,因而后发民主已沦落为民粹主义政治。在作者看来,民主的未来在哪里?这里没有统一的答案,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地缘政治和处于不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需要做出不同的选择。

近年来,埃及、泰国、乌克兰等国的民主化进程,正在挑战着被当做圣经的民主化理论命题,诸如公民社会是民主政治的前提和基础、中产阶级带来民主、民主有利于民族和解等。中国人民大学杨光斌教授的《民主是一个现实中的工具性问题——谈三大民主化理论命题的证伪》一文,用具体的事实对三大命题作了驳斥。该文指出,埃及的现实说明,公民组织的自治不等于民主政治本身;泰国的乱局证明,中产阶级的政治诉求取决于其所处的社会结构,与民主没有必然的联系;乌克兰的悲剧显示,在存在种族冲突和国家认同危机的国家,选举民主动摇的是立国之本。该文指出,很多人习惯在“元叙事”上看民主,把一个国家的好坏都归因于民主,实际上民主在价值上是公共之善,值得也必须追求,但是民主更是一个现实中的工具性问题,民主本身具有内在的张力和冲突性,这是必须务实地看到而不能选择性失明。正是基于这一点,尤其对一个大国、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多种族国家而言,实现民主的同质性条件至少应该包括:国家认同前提、基本的政治共识前提以及社会结构的大致平等性与同质性等。

对西方民主内部的问题,美国著名政治学家 F.福山应该算有发言权的。他在《美国利益》双月刊发表《美国政治制度的衰败》一文,指出美国政治文化有三个主要的结构性特征,而这三个特征当前都出了问题,即司法和立法部门(也包括两大政党所发挥的作用)在美国政府中的影响力过大、利益集团和游说团体的影响力在增加、为防止出现过于强大的行政部门而设计制衡制度也变成了否决制。F.福山认为,美国政府的问题,源于既有实力也有能力的政府与原本旨在约束政府的各个机构之间出现了结构性失衡。当前有太多的法律,“民主”程度也过了头,其表现形式就是立法部门在干预美国政府发挥职能。值得关注的是,作为全球学术界颇受关注的人物,不久前他又出版了新书《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这位曾在 1989 年称西方民主制度是“历史终结”的著名学者,根据 20 多年的观察做了大幅度的理论调整,他在新书中把“强政府”的重要性放在了首位。在他看来,秩序良好的社会离不开三块基石:强大的政府、法治和民主问责,他强调三者的顺序至关重要,民主并不是第一位的,强政府才是。据他的分析,尚未获得实施有效统治能力就进行民主化的政府,无一例外地都遭到了失败。他对强政府、法治、民主的最新顺序排列,是对全球政治经验的总结,也是他的新书最有冲击力的地方。现在他公开阐明民主既可能是有效的,也可能是破坏性的,并引起全球的关注,他的修正和突破因此有了广泛的意义。

世界左翼力量现状分析

20 世纪 90 年代初,随着苏东的剧变,欧洲左翼遭到了重创,但在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斗争中,它们重新进行了改组和整合,形成了新的“欧洲激进左翼”,目前它已成为一支活跃于欧洲政坛的重要力量。中央编译局李其庆研究员的《左翼阵线的重建与再出发——“欧洲激进左翼”:一支活跃于欧洲政坛的